

追寻“红色国际桥梁”

——亚欧大陆桥上的百年交通线

○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胡晓光 丁铭 魏婧宇

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莫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寻救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了角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时光荏苒,这条“国际桥梁”承载着“救中国”的历史风云,更凸显出“强中国”的现实风景。

交通线的“秘密”

1924年6月的一天凌晨,3辆马车从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国境线的方向。天光微明,12匹膘肥体壮的快马分别拉着3辆车奔驰,“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旷野中,惊动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车人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纷飞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5位代表,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占信说,“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条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侨修鞋铺……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满洲里地图,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点,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密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都通过满洲里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经过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出境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映着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年,中共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4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师、商人和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经满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士森来到满洲里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山地,然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士森当时患有肺病,为了不被发现,一路捂着忍着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士森病情加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分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尔滨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号码牌,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找到车灯上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车夫就会将他们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代表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浓雾中沿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杂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杂院,院里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杂货铺里还有个小地窖,来不及跑也能躲在里面。”86岁的杨文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1934年开始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亲林凤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工作打掩护。

1937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网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一家被捕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苦,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忆说,“母亲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没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杨文华母女三人后来被释放,但却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满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了两年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年至1937年,经满洲里出境的红色交通线存在了18个春秋。交通线被破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因为他们工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知消息。



一列货运列车经过满洲里国门(2020年11月17日摄)。 新华社发(果乃轮 摄)

莫斯科郊外归来

1950年7月底,一列苏联火车缓缓驶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多名孩子冲上站台。12岁的柴娥丽、13岁的肖苏华和14岁的李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处张望,他们回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批孩子多是在苏联出生、长大,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革命先辈沿着亚欧大陆桥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联工作学习;多年后,他们的后代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回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柴娥丽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父亲在晋察冀战役中牺牲。“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牺牲了,但我是党的女儿,从不觉得自己是孤儿。”柴娥丽说。

1966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车等进出口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易的发展。柴娥丽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进口汽车、工程设备产品,觉得都特别先进,到了80年代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起来,街上出现了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搞出口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的产品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

85岁的李多力回顾自己的一生,将1961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从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荣地入了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在坦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新成立的固体燃料专业,1961年他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转去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我就想为了国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我学啥,我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究刚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买了不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书学习。”1964年毕业后,李多力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1936年,肖苏华的父母从满洲里出境,沿红色交通线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年,肖苏华在莫斯科出生,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投身革命事业。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忠·维佳”,这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来的名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苏华才有了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取名“苏华”,象征中苏间的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肖苏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教学与研究,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他融合红楼梦、白蛇传、三星堆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风格的舞剧推向世界舞台。

和李多力、肖苏华等一起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肖立昂,回国后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水下摄影师。他说:“我们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要求自己兢兢业业,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向北开放桥头堡

2009年,李多力时隔59年再次回到满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觉陌生又激动。

矮小的火车站台、稀松的小平房、成片的庄稼地……这是李多力1950年回国时,满洲里留给他的印象。

繁忙的国门口岸、高楼林立的现代街

区、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曾经的“红色桥头堡”满洲里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红色交通线”如今成了亚欧经贸往来的通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大批物资通过满洲里运往国内,有力支援了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王同月老人在1954年进入刚成立的满洲里铁路换装处工作,负责出境物资的装卸,亲身经历了那个中苏铁路运输的繁忙时期。他曾回忆说:“票房以北是苏联车,以南是中国车,轨道上的车都是满的,我们1000多名换装工人,每天三班倒,不停地装运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满洲里一直是国际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东亚之窗”满洲里带来了新的使命与机遇。

悠扬的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国门,沿着亚欧大陆桥驶向欧洲。满洲里已成为中欧班列东出通道的重要口岸,经由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超过50条。

在全球疫情下,航空和海运出现不同程度停运、减运等情况。中欧班列发挥安全高效等优势,不断开拓新业务、增添新线路,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家物流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口中欧班列达3548列、324310标箱,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增长35.1%和37.6%。

火车驶出满洲里,进入俄罗斯赤塔,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秘密出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区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与内蒙古自治区共同开展跨境旅游。

“俄中边界全长超过4000公里,很有利于两国增加和发展经济协作。”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人工智能、神经技术和商业分析实验室主任铁木尔·萨德科夫说,“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贸易往来依旧密切。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15.4%,达到292.65亿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负责保护企业家权益的俄总统全权代表鲍里斯·季托夫说,俄中在合理的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按计划,到2024年,两国将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业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更加积极地安排成千上万俄中企业家相互往来。

张志强是满洲里一家商贸企业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妻子拎着背包往返中俄两国,进行小商品贸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商贸公司,代理出口农业机械、工程设备等大宗商品。“现在交通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来越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俄中研究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我认为俄中合作禁区 and 上限是不存在的。因为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是这种现实的、务实的双边经济利益,还有我们对时代大多数现实问题观点一致。”

亚欧大陆桥上的交通线,运送过探索救国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革命者后代建设祖国,又为新中国建设输送过重要物资,如今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担起更丰富的发展任务。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2日电)

一份自传里的家国情怀

○ 新华社记者 郝晓静

他是中国的“航天之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钱学森1959年9月24日撰写的自传,这也是他人入党材料的一部分。自传里,他追忆了自己选择信仰的历程。“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那一套不信任了,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的钱学森,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55年,钱学森回国,3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为人民做点事”,是钱学森的人生信条。历经艰难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几十年来,钱学森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信念不动摇。

1991年10月,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仪式上说,这一辈子有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学森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第二次是钱学森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着觉。第三次是钱学森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钱学森把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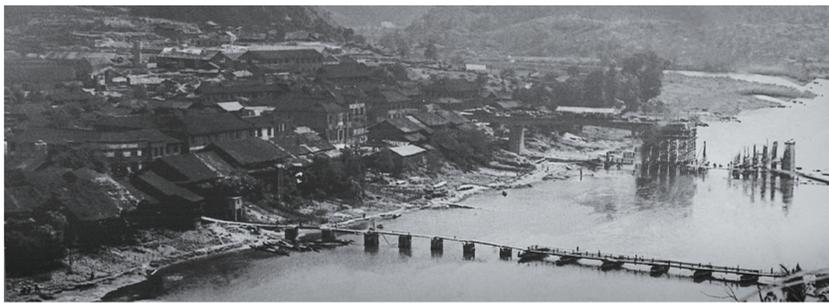


“转兵之地”谱写侗乡新华章

○ 怀化日报记者 李青青 通讯员 吴祥森



今日县溪镇。(图片由怀化日报记者陈湘清摄)



通道原县城(今县溪镇)资料照片。

图片由怀化日报社提供

“呜——”4月27日上午,伴着火车鸣笛声,每日一趟的“通道转兵号”红色专列抵达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当采访组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阵激昂的歌声。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同志的大型雕像。各地前来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党员们在雕像前高声歌唱、直抒胸臆。

万万火急! 中央红军通道转兵

追寻转兵足迹,聆听红军故事,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仿佛又闪现在眼前。

通道转兵纪念馆内,有一份万万火急电令复制品,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万万火急! 容不得半点的等待和停留。

1934年冬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来到通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是一步生死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会上争论异常激烈。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与李德唇枪舌剑,据理力争。

毛泽东认为,敌军已经调集主力部队近20万人,在湘西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红军此时应该西进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最终,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支持和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转向的方针。会后,晚上7点30分,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万万火急电令。

万万火急电令发出的第二天清晨,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

“神奇绿洲”,通道侗乡旅游兴县

红军的足迹遍布侗乡山山水水。这里,森林覆盖率达77.22%,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未被污染的神奇绿洲”;这里,侗族建筑、歌舞、服饰、习俗保存完整,被誉为“侗族文化活态博物馆”。

近年来,依托红色党史文化、绿色生态文化、彩色民族文化,“转兵之地”通道明确了“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高位推动旅游二次创业,全域、全业、全季围着旅游转。通道转兵纪念馆地入选国家30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自2014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游客600余万人次;2019年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成立以来,共接待省内外党性教育培训班210期1.1万人次,红色旅游影响力日趋扩大。

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通道接待游客仍超过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8亿元,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4%。

“红色文化”,谱写侗乡新华章

追寻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芋头古侗寨,只见鼓楼、吊脚楼掩映在群山中,造型别致,风景优美。“一盏马灯”的红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村民杨再能翻山越岭几十公里给红军带路,红军回赠一盏马灯给杨再能照明回家。

“一盏马灯”照亮了山路,点亮了古侗寨。搭乘通道发展旅游的春风,素有“大山里的侗族布达拉宫”美誉的古侗寨已入列国家4A级景区。

寨里一家名为“侗乡秘境”的民宿惹人注目。屋主吴永桃把民宿收拾得干净、漂亮,8间客房住满了客人。旺季时,她曾半年挣了9万多元。在她的带动下,村里陆续开起了七八家民宿,给当地村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红色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信会有更多人来这里浸染红军精神,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吴永桃告诉记者,侗乡人民都喜欢唱侗歌。如今,侗歌唱响致富路,侗乡迈向新征程。

【短评】

实事求是得胜利

“通道转兵”永载史册! 在“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选择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了“出路”问题,从而挽救了红军,拯救了党,夺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重温红色历史,不忘初心使命,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今日侗乡人民,正发扬“通道转兵”精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大力推动旅游兴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